红军长征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酝酿

侯中军

[摘　要]在红军长征之前，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已经对日宣战，并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长征前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逐步走向联合，在此国际背景下，红军始终高举抗日反帝旗帜，从战略上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之下加以考量，较早提出了东方战线的概念。为联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与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相呼应，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已经酝酿成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长征的胜利为中国工农红军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成为率先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战斗的典范。在坚持抗日反帝的长征行军路上，中共中央和红军实现了统一战线政策的演进：从抗日统一战线、反蒋统一战线演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关键词]红军长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专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项目编号：LSYZD21012）

[中图分类号]E29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26)05-0158-15

doi：10.20089/j.cnki.issn.1009-105x.2026.05.011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扩大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一度寄望于国际联盟，上诉国联，希望通过国联阻止日本的侵略，事实上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在采取对日妥协，寄望于外部力量干预的基础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号称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先后五次大规模进攻中央苏区，进攻抗日反帝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长征行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政策，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围绕红军长征[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②]，学界已经有了

① 关于红军长征史的代表性成果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斯诺（Edgar Snow）《红星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2008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为代表。

②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线研究的成果，代表性的论著有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李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团结出版社，2015年）。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丰富的成果。党史、军史的通史类著作一般均会涉及红军长征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①]。

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学界深入探讨“两个统一战线”的概念，并基于东方主战场初步提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战线的问题[②]。红军长征过程中，欧洲法西斯势力抬头，德国扩军备战，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面对东、西方法西斯逐步联合的态势，红军以坚决的抗日态度和行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客观上为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法西斯树立了信心。学界已经有多部著述研究红军长征的国际影响，让世界了解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性战争，是东方的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联手发动的侵略战争，如果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起源到胜利结束的过程置于东西方联动的格局下加以考察，则红军长征对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

一、红军高举抗日旗帜开始长征与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转化

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日本军国主义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策源地形成。日本妄图先侵占东北，然后灭亡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爱国军民奋起抵抗，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并同时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强调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是企图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中国永远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从国际政治局势出发，决议明确指出了东方战线即将形成的事实：日本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强占中东路南段，已经暴露了挑衅苏联的军事企图，“英国帝国主义停止现金兑现的决议，德国总参谋部之活跃”，均表明了“反苏战争已经准备妥当，东方战线的开始爆发将是极大的可能的前途”[③]。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东方战线，从广义上讲，是指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从狭义上而言，则是建立起针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及苏联的军事政治联盟。

① 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称与表述的研究集中出现，可参见夏静《“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周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定名与表述考辨》（《军事历史研究》2025年第6期）。

② 论著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第4编；论文参见侯中军《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两个统一战线的建立》（《史学集刊》2025年第4期）。“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两个术语名称在目前学界均有使用，本文在一般情形下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宣言,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①]。中共中央对日宣战布告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正式宣布以日本侵略军为自己的敌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终作战任务就是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指示工农红军原总政治部、红军各级政治部,立即实行对日作战的政治动员,“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激励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②]。红军发表《对日战争宣言》,为此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北上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始动议。之所以将红军对日宣战视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初始,是因为红军将“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蒂”作为斗争纲领的一部分,红军的抗日属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四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纠集兵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为了北上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同时配合红军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1934年7月,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经过数月的准备,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初,军事指挥上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红军受到严重损失。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发表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北上抗日。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东北数年,并开始侵占华北与内蒙古,呼吁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抗日。11月30日,红25军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布告,明确红军北上是要“打日本帝国主义”,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参加红军,“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③]。红军先后派出两批抗日先遣队,是继对日宣战之后工农红军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的又一举措。

1935年1月7日,红一方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等人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政治上的关门主义,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遵义会议在挽救了红军、挽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9页。

③ 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了中国革命的同时，也挽救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战线成立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于1935年3月31日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跳出了蒋介石设计的包围圈，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四渡赤水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中最为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①]。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后，4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指示，强调全体指战员、政治人员，要有“最大的坚定性”，有“胜利的信心”，强调要“铁一般的团结”，并指出“军阀的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有加无已”[②]。

在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际，日本法西斯不满足于《塘沽协定》已经获得的侵略权益，挑起察东事件，并借口胡白事件，有意侵占华北。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内部讨论时认为“二十年来对中国交涉，如无军部压力，则无一事成功”，一是建议以武力驱除中央军出华北，二是建议日本军部采取激进措施[③]。日本少壮派军人日益鼓动对华扩大侵略。日本在《华北交涉问题处理要纲》中提出，以华北驻屯军为主，展开与华北地方政府的交涉，希望能迅速解决事变，达到既定目的。日本的目标在于迫使排日团体离开平津，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同时还希望能够迫使中央军撤退到保定以南，禁止天津地区国民党的活动[④]。6月9日，日本向何应钦提出了上述要求。日本坚持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的活动，撤退51军，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并限国民政府于6月12日中午12点前答复，否则将采取断然处置[⑤]。

面对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自《塘沽协定》以来，继之黄郛南下，日本帝国主义即已提出吞并华北，征服中华”。上海临时中央局还认为，华北事变的发展，已经扩大到全中国范围，引起中国新的危机，因为日本在“恢复对华外交常道与督促南京善处河北问题的掩饰之下”，正准备实行政治经济的总进攻：建立平津军事侵略基地，发动夺取华中的侵略战争。针对日本要夺取整个中国的军事侵略计划，上海临时中央局特别强调“华北这次事变的发展，使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日益加紧”，必将进一步引起“日本与美国等帝国主义争夺太平洋霸权的强盗战争”。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事实上在“加紧干涉川陕苏维埃革命”，而蒋介石则自华北撤退转而进攻川陕，已经阻碍了川陕红军的抗日作战。上海临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② 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③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65页。

④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70页。

⑤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7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时中央从国际局势出发,已经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相联系,强调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也是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做贡献[①]。

针对华北事变后的国内外局势,上海临时中央局认为,目前党和红军的紧急任务是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之前提出与一切军队订立武装抗日的协定,其后又号召全党坚决拥护并实现“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筹备会提出来的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能够进行和领导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彻底的民族革命战争。此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将反蒋置于抗日反帝的革命纲领之下,而且重点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上海临时中央局指出,基于华北事变后中国革命和红军武装抗日的实际情形,应当在“顺利实现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之下”开展两个统一战线的斗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统一战线”。在华北事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党所提的两个统一战线仍然未摆脱下层统一战线的片面认识,但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两个统一战线之间并不孤立存在,而是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的,“每一个真正的严重的反日武装行动,迟早不免转变成为反蒋的武装斗争”,同时“每一个大的武装行动也有可能转变成为与日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②]。此时的两个统一战线,仍然是限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内部的统一战线:一是抗日统一战线,二是反蒋统一战线。但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情形而言,反蒋和抗日存在转化的可能。随着红军长征的进行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逐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相契合,而红军所展现出来的抗日的决心和勇气则使得国际民主力量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面对日本对远东格局的挑战,英美法等国固然对日存在妥协,但如果有一支坚决抵抗、誓死不屈的武装力量,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乐见的存在。随着德意日法西斯逐步勾结,结成发动侵略的军事同盟,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及反蒋统一战线,开始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转变。

继向党内部署紧急任务后,上海临时中央局于6月15日又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一步一步地实现并吞全中国的田中计划。上海临时中央局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是彻底的反日、反蒋的革命战争,如果不是工农红军坚决地抵制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日本帝国主义早就要侵占华北。中国民众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的蒋介石,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只有结成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凡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要团结起来拥护抗日反蒋的红军。这份告民众书与向党内布置的紧急任务是一致的,将红军的长征归因为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及不自觉配合了日本侵吞中国的计划,中国工农红军的反蒋,其最终目的是反日,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尽管蒋领导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下的国民政府有其抗日的策略和考虑，但经《塘沽协定》和《秦土协定》后，其抵抗的意志和成效并未得到国际的认可。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中国驻国联外交人员面临着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认为中国在日本的侵略之下一再妥协退让，影响国际观感，无法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正如顾维钧所言，“增世界之轻视”“失与国之同情”①。

在长征中，红军始终从政治上高举武装抗日旗帜，正式向外界展现了以红军为代表的中国军人的抗日决心以及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国际舆论界，红军以战胜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决心、有能力战胜日本法西斯。正如上海临时中央局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中国并非蒋介石所宣称的没有抗日的力量，工农红军已经证明，在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下，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可以“打倒蒋介石卖国贼和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②。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发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告全国民众书》的同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陈述了红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持续抗日诸般事实：对日宣战；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无效；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订立作战协定，共同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军坚决抗日行动相比，宣言对比指出，蒋介石动员百万军队阻拦红军北上，并把东北、华北拱手让与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在对比红军与蒋介石对日作战的态度后，强调“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并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北上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③。

华北事变发生之际，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北。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及反蒋统一战线。此时，中共中央已经认清了蒋介石对日本侵华的妥协性，并预见了反蒋战线与抗日战线的辩证关系，认识到两个战线之间必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一步演变。

二、共产国际七大倡导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与红军抗日的世界意义

因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自 1934 年 10 月起，中共中央与上海党组织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中断，共产国际与处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的联系亦因而中断。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遣潘汉年、陈云先到上海，后辗转到了莫斯科。潘汉年在上海起草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函，汇报中断了 8 个月无线电联系期间的中共中央及工农

①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数位版，《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3年），Wellington Koo Papers，Koo-0009-018-0128-00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8、210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红军的革命活动。潘汉年指出,随着红军长征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关于统一战线以及党与苏维埃策略的运用方式问题,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不少从实践中得出的看法”,其本人与反对蒋介石的军阀集团有过接触,听到过各种意见。潘汉年在信中强调,“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探讨一下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问题”。针对华北事变后的局势,潘汉年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搞阴谋,要动员各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需要讨论“党和苏维埃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①]。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要调整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一认识上的转变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做出的思考,这也意味着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酝酿调整抗日统一战线和反蒋统一战线。随着长征的逐步完成,两个统一战线已经渡过了初级阶段,需要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调整。

日本逐步扩大的侵华行动已陷中华民族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面临国民党军阀的围追堵截,中国工农红军坚持抗日反蒋,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在红军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呼吁驱逐日本军国主义出中国的过程中,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对于正处于抗日反蒋过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政策的调整,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在共产国际七大开幕词中指出,“统一战线运动是共产国际取得更大胜利的一种保证”,并呼吁向发展壮大的中国革命致敬,强调中国工农红军在多次战役中击败了蒋介石的雇佣军。威廉·皮克将红军正在进行的长征与同时期的世界革命运动并列,一体视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德国劳动者的英勇斗争、英国海军水兵的罢工、美国退役军人的运动、波兰农民暴动、奥地利及西班牙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如果从世界范围内看,在这一时期公开的无产阶级斗争或运动中,中国工农红军发出的武装抗日号召以及正在进行的长征,已经是一个典范,足以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引人瞩目的东方革命[②]。

1935 年 7 月 26 日,威廉·皮克向大会汇报共产国际六大以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整体上将日本侵华视为帝国主义总体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世界革命的角度高度评价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的世界意义。威廉·皮克指出,共产国际六大以后,中国苏维埃革命是一个突出事件,深刻影响了战后的殖民地世界,“具有非常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成了整个殖民地世界劳动人民的榜样”,并赋予中国革命以世界史意义上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产生了具有充分权力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革命和土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16-218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 17 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年,第 64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革命“第一次以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形式来进行”。在肯定中国苏维埃革命重大的世界史意义的基础上,威廉·皮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置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国际局势之下,强调中国苏维埃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威廉·皮克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军事侵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拒绝抗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拯救中国人民、使其免遭日本奴役的旗帜,举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旗帜”,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难以向中国内地推进[①]。

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结合中国革命变化的状况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最新指示,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疾呼,中国国家、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宣言将能否坚决抗日视为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并梳理了九一八以来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等少数人以“不抵抗”政策放弃中国领土主权、镇压抗日反帝运动并发动内战的行为。对于国民党无底线的退让和妥协,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而且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宣言称,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犯下何种卖国罪行,其存废与否,日寇无置喙余地,“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宣言此种表态,事实上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内的抗日力量,并进一步调整“反蒋统一战线”,做出了实质性的行动[②]。

在此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再次郑重提出:为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论过去与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的任何仇恨、任何分歧,红军不但立刻停止对其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并呼吁组织起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组织起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③]。红军在此宣言内的郑重承诺与历次抗日宣言一脉相承,以实际行动呼吁建立抗日反帝的统一战线。在对内调整反蒋统一战线、联合组建抗日联军的基础上,宣言正式提出了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个口号不同于以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已经具备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初构想。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八一宣言》之际,共产国际七大进一步明确了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第76-7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2-26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5、26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计划。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言,呼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进攻,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季米特洛夫亦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他认为,“中国苏区是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①]。季米特洛夫特别指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两者是在实际斗争中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反法西斯的实际斗争过程中互相转化”[②]。相较于中国革命的环境,共产国际及苏联在分析和研判欧洲局势和远东局势时,对于来自德意日的压力有更为清楚的感知。季米特洛夫提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辩证关系,这对于已经认识到抗日统一战线与反蒋统一战线之间存在转化关系的中共中央无疑是一个理论上的提醒。

共产国际七大在论述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就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基础上,讨论了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所承担的任务。陶里亚蒂从世界法西斯力量的演变和发展出发,指出日本是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大国,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已经着手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日本的目的,“不仅是在远东,而且是在整个东亚和太平洋西岸地区建立霸权”。陶里亚蒂强调,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1亿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制度,这是“横在日本强盗实现其掠夺计划的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日本军阀“视苏维埃中国为死敌,无论如何也要消灭它”[③]。陶里亚蒂将中国革命与日本法西斯之间的敌对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武装抗日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之间存在天然联系。

三、红军会师西北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完成长征。中共中央针对新的形势,在坚持贯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一基础上,仍将“抗日反蒋”作为总策略和党的主要任务。此时的统一战线被分为三种形式:上层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上下层统一并用的统一战线。但上层的统一战线的对象仍限于国民党内的重要官员或社会名流,目的在于反蒋,属于对抗日战线与反蒋战线的扩展,尚未从理论上廓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间的关联[④]。尽管此时中共中央仍将反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第91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第95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第113-11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蒋与抗日视为一体，但已经注意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将中国的抗日与国际法西斯的侵略相联系。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和红军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任务。在总结发言中，张闻天强调了国际形势变化与此后党和红军任务的关系，尤其是将意大利发动的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开”，并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出发，预言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将加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减弱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反革命的帮助”。张闻天还强调了打通与苏联及共产国际交通道路的必要性，“国际路线无论如何要打通”，“主要是为取得政治帮助”，如此做的主要考虑就是日本将加紧进攻中国[①]。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日本吞并华北，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西北“使日本帝国主义张皇失措”，呼吁全国的民众“拥护中国苏维埃与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反蒋的英勇斗争”[②]。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将陕北建成领导抗日的中心，发动群众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毛泽东在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向红一方面军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指出，此次胜利影响重大，“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国的”，我们也不允许日本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和灭亡外蒙古，一旦日本进攻苏联和外蒙古，“我们要打它的侧翼和后路”，“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担任打一条火线”。毛泽东在这里将红军作战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进行了阐释，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东西方走向大战，红军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守住了东方战线，而且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消灭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③]。

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宣言的核心要旨，一是表明红军长征的目的是抗日，二是呼吁与任何愿意抗日的力量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并“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宣言开篇即指出，继东北四省沦陷后，现在又是华北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动员，开展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取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直在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抗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在此宣言内，中共中央呼吁“联合朝鲜、台湾**地区**、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要求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后者

① 《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5-44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5-366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已经朝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又迈进了一步[①]。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因为该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尽管毛泽东提出了对于时间和路线的不同建议,但总体上该方针将红军抗日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体战略之内[②]。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在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军事战略的报告,张闻天做了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提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总任务之下,要组建抗日联军,要明确“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③]。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目前形势的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激化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并断言“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全中国人民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这种革命高潮将以“与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响与互相帮助的性质出现”,中国革命已经脱离了过去的孤立状态,“中国革命现在就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④]。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是孤立的斗争。他强调,只有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其战略意义与国际支持的可能性。通过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包括国际上的进步力量,中国革命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外部援助,从而加速胜利进程。这一论断不仅提升了全党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也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指引中国革命走向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的关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就是在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⑤]。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与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关系,提出了将决议中关于“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民族化”的问题。张闻天指出,“中央以前的决议基本上是同这些决议相符合的”。张闻天指出了世界大战的危险,即日本、意大利已经开启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国抗日战争是“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这里已经蕴含了以抗日战争促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底线逻辑:德、日、意在酝酿结成侵略同盟,而中、苏、英、法、美等国在接近成立反法西斯的同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拥护世界和平,反对进攻苏联,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张闻天指出,红军要在实际行动中充分表示他们是抗日的先锋队,红军的东征就是要“发动抗日,争取对日作战”①。

1936年4月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第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并于4月5日发布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宣言。经过红军持续的抗日反蒋宣传,张学良同意一旦红军对日作战,“彼即可公开号召抗日,不打红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尽管学良尚不会反蒋,但“蒋真降日,彼即离蒋独干”②,与东北军事实上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红一方面军在组建红军抗日先锋军后,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6月19日,林育英致电朱德,要求红二、四方面军北出甘南,策应时局。7月1日,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甘孜,林育英等致电庆祝,指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已经联结在一起,待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必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角度开始思考和制定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反帝战线策略,中国的抗日就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战。毛泽东通过到访的斯诺,将此理念进行了深入论述。7月15日,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通过介绍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广泛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政策及对世界反法西斯形势的认识。该篇谈话标志着红军已经将中国的抗日战争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中国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侵略也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制止日本的侵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毛泽东在这里所提议的反日统一战线,就是国际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59页。

②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60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接着分析了各国面对日本侵略的具体态度,认为列强中有些不愿日本占领中国,如美、英、法、荷和比利时。还有一些长期处于强国威胁下的国家和弱小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印度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这些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中国都欢迎。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希望并相信,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①]。

当斯诺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时,毛泽东告以,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是两国的共同敌人,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②]。

毛泽东在 8 月 10 日致章乃器等信中指出,“一年多以来,我们为着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是经过了长期艰苦的奋斗”,诸多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愿意联合各党各派为祖国生存而奋斗[③]。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决定联合东北军,三大主力红军互相配合,打通与苏联的交通渠道,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实现,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与欧洲主战场沟通渠道。9 月 1 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指示,不应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抗日反蒋”的口号已经不适当,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持续进攻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④]。10 月 10 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 月 22 日,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成功会师。红军三大主力西北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东方战场在提出并酝酿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同时,德日两国正密谋订立军事同盟,侵略者首先建立了侵略的战线。1936 年 11 月 25 日,德日两国订立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两国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了公开的军事同盟。

四、结语

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目标及宣传动员均与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活动紧密相关。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摸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不可避免出现“左”倾或

①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90-391、395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98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32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76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右”倾的错误，甚至一度将共产国际的革命指示完全照搬到中国革命实践中，但如果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大局出发，中国革命起初就已经属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直在扩大对华侵略，并与德意法西斯逐渐联合。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先后派遣两支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屡次发表抗日宣言，表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目的就是抗日。长征过程中，红军在与国民党的追击及堵截部队进行激烈战斗的同时，始终将自身的战斗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进行紧密联系。

埃德加·斯诺通过其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向西方世界、向希望了解中国革命的国际人士提供了第一手令人信服的采访及观察报道。斯诺在该书的序言部分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中共真的被消灭了，那么广田弘毅为什么向蒋介石提出了所谓“广田三原则”，要求南京与德日订立反共协定呢？正如斯诺在作者序中所言，“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①]。斯诺之问，揭示了一个被国际学界所忽视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工农红军是最坚决的抗日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组成部分。

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在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在不同的阶段始终把“保卫苏联”，“牵制日本进攻苏联”作为自己的军事战略目标之一。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东方战线的概念。东方战线概念的提出，对于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都是一种理论上的先导和酝酿。尽管此种决策在特定阶段曾经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如果将其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背景之下，则红军的口号及其决策具有更为实际的影响：在九一八后，中国战场已经着手应对德意日法西斯正逐渐形成的侵略联盟。三大主力红军完成长征，中共中央已在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对两个统一战线的改进，从抗日统一战线、反蒋统一战线开始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而言，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完成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建立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而言，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了从“抗日反帝”到“反法西斯联盟”的转变，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树立了东方样板。

（作者：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侯中军工作室，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新民主主义外交史研究）

（责任编辑：付继娟）

①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and the Ges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HOU Zhongjun

[**Abstract**]Even before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the Provisional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had already declared war on Japan and dispatched the Northward Anti-Japanese Vanguard Detachment. Around the time of the Long March, the fascist aggressor forces of Germany, Italy, and Japan we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 an alliance. Against this international backdrop, the Red Army consistently held high the banne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opposition to imperialism, strategically situat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ithin the larger framework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Eastern Front early. To achieve victory over the fascists, echoing the resolutions of the Sev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le build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was already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an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won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prestige for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establishing it as a pioneering model in the fight against Japanese fascism. Throughout the Long March, while upholding the cause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opposition to imperialis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Red Army brought about an evolution in united front policy: from an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and an anti-Chiang Kai-shek united front to an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an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Key words**]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